

● 世界历史

亚太经济中美日“蜜月”初探^{*}

张 德 明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张德明(1949-),男,湖北京山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历史和亚太经济关系的教学和研究。

[摘 要]美日“蜜月”的表现是: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呵护;日本对美国亚太经济政策的追随;合谋共享东亚市场;双边关系上的互利互让。“蜜月”的原因:“城下之盟”的结果;战略上的互需;经济上强烈的互补性。“蜜月”的特点是:深浓的政治、军事色彩和地位的不平等性。

[关键词]亚太经济;美日“蜜月”;表现;原因;特点

[中图分类号] F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 03-0309-08

1947—1965年是亚太^①经济中美日关系空前绝后的亲密时期,堪称“蜜月”。对美日“蜜月”的表现、原因和特点至今还未见到有文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作一尝试以抛砖引玉。

一 “蜜月”的表现

“蜜月”表现之一是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呵护。二战结束时,美亚太战略的初步设想是以旧中国为支撑点,抗衡苏联、惩罚日本,以旧中国为模式在东亚全面推行新殖民主义以主宰亚太经济。为彻底消除日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潜力,防止其重新成为自己东亚利益的心腹之患,美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推行严厉的改革措施。随着冷战的降临和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美对其战略设想进行重大调整:从 1947年起把支撑点从中国移到日本,将昨天的敌人日本视为盟友极力扶植,以对抗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于是在日推行“逆转路线”。美对日经济的呵护集中体现在帮助日经济自立和支持日重返亚太经济。

(一)帮助日经济自立

首先,废止波利赔偿计划,取消日赔偿义务。波利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将日 2 000 万吨钢铁设备、3/4 以上的机器、全部铝镁和 3/4 的造船业^[1](第 41 页)拆迁给东亚国家作为战争赔偿。1947 年初,美军部开始对波利计划发难,分批遣使团赴日“审查”该计划,起初提出减轻拆迁负担的 1/3,接着要求减轻重工业类负担的 90%,战争工业类的 60%^[2](第 84 页),最后由总统杜鲁门 1949 年 5 月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13/3 号文件使波利计划完全废止^[3](P. 82)。其次,积极提供经济援助,启动日本工业。日工业复兴的主要障碍是无外汇购进原料。为解决此问题,从 1947 年起美连续给日拨了几笔款。1947 年 10 月政府建立 1.35 亿美元的“被占领的日本输出生周运转基金”。1948 年 6 月国会建立 1.5 亿美元的“自然纤维周运转基金”,资助日进口美的棉花以刺激纺织业生产。国会于 1948 年 4 月至 1949 年 6 月又拨 1.65 亿美元的

“占领地区经济复兴”援助^[3](P. 75)。1947年起的4个美会计年度里用于复兴日经济的美援共15.67亿美元^[4](第32页)。再次,推行道奇路线实现预算平衡。1948年底总统批准了《日本经济自立计划》,任命在西德货币改革中崭露头角的约瑟夫·道奇为特使赴日贯彻。道奇路线彻底根除了日的通货膨胀,极大地刺激了出口,为日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第四,以自己在东亚的军事扩张为日提供赚取美元的市场。道奇路线虽稳定了日本经济,但未能解决严重的美元短缺问题。该问题成为制约日经济自立的瓶颈。为解决此问题,1950年上半年,美陆军部副部长沃里斯(Tracy Voorhees)和美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制定了把对亚洲的军事援助与对日的经济援助相结合的地区协调援助计划。具体说来就是以美在亚洲的军事干涉来重新启动日的军工生产^[3](P. 139-140)。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实施该计划提供了好时机。1950年6月至1954年,美为朝鲜战争以及有关物资在日花费近30亿美元^[3](P. 146)。“特需”的协调援助对解决日美元短缺问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工业的全面复苏。朝鲜战争结束后,协调援助计划继续实施,到1960年日美元短缺问题得以彻底解决^[3](P. 59)。

(二)支持日重返东亚经济

美决策者考虑到日经济复兴离不开广泛地对外贸易,要使日经济自立就必须让它与东亚经济重新结合。为此,美作了各种努力,最主要的措施有:(1)谋划了协议战争赔偿,为日重开东亚经济之门提供了钥匙。由美一手操纵而签订的《对日和约》第14条对赔偿的性质、形式和注意事项作了明确规定^②。协议赔偿与波利赔偿计划有着质的区别:后者对日是惩罚性的,赔偿的主动权掌握在盟国手中;前者对日有利,赔偿的主动权在日手里,其目的是通过象征性赔偿,缓和东亚人民对日的痛恨情绪,以便日能重进东亚商品和原料市场。由于赔偿是协议性的,故未对日造成经济负担^③,反而“有利于日本经济,因为它将使日本过剩的工业能力发挥作用,给人民以就业机会和重开贸易渠道”。日通过对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赔偿,恢复了与它们的经济关系。(2)协助日加入亚洲和国际经济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科伦坡计划(1954年)、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1954年)、湄公河工程(195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2年)、关贸总协定(1955年)、联合国^④(1956年)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4年)。有些组织,若无美国的庇护和支持,日很难进入。仅举两例:1951年后期,日正式要求美让它加入产生不久的科伦坡计划。美官员同意,认为科伦坡成员资格能使日将一只脚伸入东南亚市场的门内,有助于克服不利于日市场渗透的障碍。英国由于害怕日的竞争,不赞成日参加,但在美的压力下,最后只好让步^[3](P. 209)。1963年7月,日申请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遭到绝大多数成员国的强烈反对,由于美的坚决支持,日才如愿以偿^[5](P. 283)。美帮日进入这些组织对日重返亚洲和国际经济舞台的作用不言而喻。

“蜜月”表现之二是日本对美国亚太经济政策的忠实追随。美对日经济百般呵护,日则对美亚太经济政策忠实追随。美在东亚的经济利益说到底是个市场问题。为东亚市场,美日角逐了40年(1905-1945),好不容易到手的猎物,又受社会主义的“威胁”。因为在美看来,社会主义的扩展就意味着自己东亚市场的萎缩。所以,美一条至关重要的亚太政策就是通过与日结盟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以保护和扩张在东亚的市场。日甘愿为美效劳。50年代上半期,日美签订4个重要文件:《对日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行政协定》和《共同安全法协定》。其中规定: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驻留,驻日美军可用以“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和应要求镇压日本“内乱”;日应向美无限制地提供军事基地,美军人员及其家属在基地内外享有治外法权;日接受美的武器等军事援助,承担起加强自身军事力量“为增进自由世界的防卫力量作出贡献”的义务。这些条约严重损害了日的主权,将日绑在美的战车上。然而,日居然签了字,成了美东亚市场的主要看守者。美的另一亚太政策是遏制新中国经济的发展。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视新中国为苏在亚太扩张的副手,无时无刻不想拔掉这颗眼中钉而后快。美反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遏制其经济的发展,这体现在1951-1952年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美日经济合作计划中:“美国以军事订货的形式和在东南亚的责任心为日本提供经济刺激和美元补贴,以此换取日本对美国亚洲政策,尤其是对不承认中国的政策的执著追随。”约瑟夫·道奇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日本的作用之一是“创造一种以支持自由世界之目的(即不与中国贸易)的外贸模式”。美国的责任

是“继续支持日本为联合国在朝鲜的努力而生产和参与东南亚的重建以及经济援助的获得”^[3] (P. 151-152)。对此政策,日基本上是不折不扣地执行。首先,严格遵守“巴统”制度,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巴统”成立不久日随即加入。“巴统”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只禁运“国际货单I”所列物品,对“国际货单II”的物品只进行数量管制。日追随美同意对华禁运两单全部物品,并加上美日共同确定的在安全领域内必须禁运的物品。在专门负责对华禁运的“巴统”内的“中国委员会”解散的1957年,首相岸信介在华盛顿讲:日本作为一个自由国将继续遵守国际规定,对华实行战略物资禁运^[6] (P. 20)。直至1964年下半年,日对华禁运项目还有155项,对31种物品的管制反而加强了^[6] (P. 78)。其次,日政府长期拒绝同新中国建立官方经济关系,使日中贸易难以顺利进行。历届日政府不顾日中经济互补性和违背两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拒绝与华建立正常的官方经济关系,致使50年代两国关系处于民间贸易的水平。且因日政府对民间贸易不承担责任以及禁运和以物易物造成的困难等原因,贸易协定的执行率也不高。60年代初以后,虽然日政府放弃了完全拒绝与华建立官方经济关系的顽固立场,但1962—1971年经济关系只维持在半官方的水平。再次,以“政经分离”的原则限制日中贸易的发展。即在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只在许可的范围内与之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以满足本国之需。这一原则不仅遭到新中国的强烈反对,就连日政府在执行中也无法“政经分离”,总是让经济服从于政治。仅以“吉田信件”为例,1962年11月,“高奇——廖备忘录贸易”的签订标志着两国贸易关系升级至半官半民的水平。翌年6月,中国技术进口公司与日仓敷人造丝公司签订了第一个从日引进成套设备总金额为73.58亿日元并使用日本输出银行贷款的合同,不久获日政府批准。台湾当局对日提出强烈抗议,以暂停台日政经关系相要挟。在此压力下,首相池田勇人派前首相吉田茂赴台,后以书信形式保证:日政府将不允许日出口商利用输出银行贷款向中国大陆出口,这就是所谓“吉田信件”。“吉田信件”对日中贸易关系带来了莫大损害。中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了一批与日签订的合同。1964—1965年,中国大陆在资本主义国家订购的21套工业设备中,只有2套是日本的^[6] (P. 79)。这充分说明,日政府“政经分离”的实质仍是忠实地追随美的亚太经济政策。

“蜜月”表现之三是合谋共享东亚市场。美日各自目的都是获取东亚的商品、原料和投资市场。为此,两国在对东亚的经济援助、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中密切合作。经济援助是美日抵消社会主义国家的魅力、削弱英法荷的影响和加强自己地位的一把多功能剑。美对东亚的经援最驰名的是“杜鲁门第四点计划”,另外还有防务支援、特种援助、技术合作、开发贷款基金、意外事件基金等^[7] (第213页)。第四点计划一出台,首相吉田茂就出来捧场说:东南亚还未开发,居民生活程度很低,是最适于共产主义萌芽的温床。为了努力开发资源使当地民族丰衣足食,就“必须有效地运用美国的所谓第四点计划”^[8] (第178页)。日对东亚的经援是从协议赔偿开始的。如前所述,这种特殊的“经援”完全是在美的支持下才得以进行的。从二战结束到1965年,美给韩国、南越、菲律宾和台湾以巨额经援^⑤,对其他各国也予以大量援助,成为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外其余国家和地区经援的主要来源国。以美援为主,日则辅之以协议赔偿、商业贷款等。在多边援助方面,从科伦坡计划到50年代中期,美已超过英成为提供资金最多者。在湄公河开发计划中,美日已成为主角。经援不仅是培养情感和施加影响于东亚的手段,也是直接占领东亚市场的途径。美日不是利用经援输出过剩产品就是将它与购买本国货挂钩。正如美参议院所言:“我们向国外提供的信贷,几乎每一美元都回到美国而发挥它的用处,即在我们本身的经济中创造销路而维持它不致发生不景和萧条。”

大规模的经援有力的促进了美日与东亚贸易的发展,以致两国对市场和原料的占有率大幅度提高。到60年代上半期,在东南亚和香港,除了英法分别为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第一贸易伙伴外,在其余国家和地区,英法荷的贸易主宰地位几乎全为美日所取代。即使在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外贸中,美日也紧逼英法之后。在东北亚,台湾和韩国外贸的主宰战前是日本,战后两地为美的势力范围。可是,美不但未独霸其外贸,反而极力促成日台, ,让日分享两地市场。

,美也帮助日菲签订贸易协定。

,美也毫不在

、,成了日工业品的主要输出市场和粮食、。

,其余国家的外来投资分别由英荷法主宰

。 ,美资从 50年代末开始在外资中占首位直至 1963年其企业被印尼国有化。

,英资仍居首位,但美资、,在马来西亚分居第二、,在新加坡分居第三、。

,情况与战前无大变化,美资几乎垄断了其投资市场。

。 ,在香港,论公司数量,美国居首,将英国排斥到第二位,日本则居第三。 ,美资均占统治地位。 ,整个东亚除了马来西亚

,在其余国家和地区均是美日资本居第一、。

“ ”

(一)美日互为商品市场

被占领期间,日就是美商品的重要市场。

。 ,自然纤维周转基金则是专为资助进口美国棉花而设立的。 “

。……

,它是一项关键的政策”^[3](P. 75),日仍为美的重要市场。 1951年2月发布的第一个日美经济合作计划将原打算实现食物自给的目标改为依靠美农产品进口来保证食物的消费^[3](P. 162),美就成了日食物和原料的重要供应地

、,1951年分别为 33. 6%、70. 9%和 97. 3%,1956年为 12. 1%、80. 1%和 74. 7%^[6](P. 29)。 1954年和 1956年与美签订过剩农产品购入协定,共接受 1. 66亿美元的农产品^[3](P. 184— 185)。 1957年尽管澳大利亚粮价比美的低,但在美种棉信贷的吸引下,日仍购美而不买澳的粮食^[3](P. 185)。 ,日就成了美在东亚的最大市场

1951年的 6. 95亿美元增至 1960年的 15. 54亿美元,继增到 1965年的 23. 66亿美元,分别占日进口的 33. 9%、34. 6%和 29%^[9](P. 136)。 ,美也是日产品的主要市场。 ,进入 50年代后日对美出口增长甚快,输出值从 1951年的 1. 85亿美元增至 1960年的 11. 02亿美元,再增至 1965年的 24. 79亿美元,分别占日输出的 13. 6%、27. 2%和 29. 3%^[9](P. 136)。 50年代,日向美输出产品主要为生丝。 60年代后,向美输出钢铁产品。

50 60年代,美都是日最大的棉织品市场。

(二)美成为日资本和技术的主要来源国

占领期间,美向日提供经援共 21. 28亿美元^[10](第 264页)。 1950— 1968年,日接受外国贷款共 47. 752亿美元,其中直接来自美的为 24. 898亿美元,占 52. 14%,若加上美控制的世界银行的贷款 8. 69亿美元,则占 70%。 1949— 1965年美对日直接投资共为 6. 75亿美元。 ,日的科技水平比美落后 20— 30年,故日大量引进美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 1950— 1964年日与外国签订的技术专利权使用协定共 3 200项,其中 A类协定占 2/3以上,余者为 B类。 A类协定占 A类总数的 60%,与之签订的 B类的相应比重为 53%^[11](P. 203 204 246)。 8. 686亿美元。

,那么上述金额中近 60%是付给美的。

。 60年代初,日与美科技水平的差距已缩短为 10— 15年^[12](第 130页)。

,一方面使自己成为美的资本和技术市场,美大赚其钱。 ,促进了日经济的迅速发展。

。 1955年。 ,日在美倾销女罩衫 4 800多万件,占领了美该市场的 1/4^[13](P. 109)。 ,美在适度容忍的同时要求日实行“ ”。 1955年 12月日同意美的要求,对向美输出棉织品实行临时限制,1957年又实行为期 5年的“ ”。“ ”

1962年、1963年和 1965年不断实施^[13](P. 110)。 ,美嫌日市场开放不够,以各种手段对之施压,迫其实行贸易和汇兑自由化。 但仍作了让步,从 1960年 6月起实行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到

1964年4月已有93%的进口商品实现自由化^[14](第61页),且未达到激烈的程度,加之双方互相让步,故直到1965年美日“ ”。

,于1965—1966年始挑战美在东亚经济中的主宰地位;1965年美在越战中推行“ ”,以武力扩大在东亚势力范围和市场的行径变本加利,日对此不予配合,只埋头发战争之财;同时,美日双边贸易摩擦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加剧,60年中期以后美日“ ”。

、“ ”

(一)城下之盟的结果

美日同盟是在日被美占领的特殊情况下,战胜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战败国的产物,并非在平等条件下相互自愿的选择,尽管日是身不由己被迫接受这种同盟,但美这种单方面的意愿给因战争而山河破碎的日带来了新的希望,因此日也乐意接受,日处于受冷落。

。美转而扶植它,作为自己在东亚与苏联和社会主义抗争的桥头堡,找到了柳暗花明的感觉。

。在长达6年的占领期间,美培植了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亲美保守势力,使日确立了完全依赖美复兴经济的“ ”,而且这一政策为吉田茂之后的历届政府所继承。

(二)两国战略上的相互需要

战前美与日争夺东亚市场,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它首先要阻止社会主义在该地区的扩展,然后还要巩固东亚的资本主义市场,美在隔洋的东亚非有一个忠实得力的同盟者不可。已屈服于自己的日本首当其选,一则在与苏争夺东亚势力范围和市场的斗争中美在东亚有一个前沿阵地和强有力的帮手;二则可以保有日本这个东亚最重要的市场;三则还能够通过恢复日本昔日“ ”。

,解决威胁美经济发展的严重的世界性美元短缺问题,以及排斥对东亚经济有重要影响的英荷法,美的亚太经济战略是通过与日组成“ ”^[3](P. 10—11),日是美亚太经济战略中的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

,它要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只有走和平发展经济之路。

、,这包括借助美的核保护伞以节省军事开支用于经济建设,利用美的资金、。日要发展对外贸易,东亚则是其最基本的原料产地和最重要的市场。、,在美欧市场上日本商品的竞争力差,无论是东南亚还是东北亚经济,都必须得到美的同意且需要美的斡旋。日的亚太经济战略集中到一点就是死心塌地地追随美来复兴经济。

:“ ,美国是无可非议的绝对权威,如果军事上不纳入日美安全体制,在经济上不依赖对美贸易,那么日本的独立是不可能的,说他‘ ’,但吉田还是认为只有‘ ’。”^[15](第181—182页)。

(三)两国经济强烈的互补性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因双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两国就存在着经济上的互补性,战后两国经济水平差距更大,因而互补性更强;战后急剧膨胀的美垄断资本及其掌握的高新科技早已看中了日本的工业基础和投资环境,如前所述,以经援和投资的形式浩浩荡荡地进入并占领日本市场。“ ”(1955—1957年)日大规

”^[4](第 5 页),日是个缺食物和原料的大户,美则是有大量过剩农产品和原料的卖主。50 年代下半期,日消费的一半以上必须仰赖输入的粮食和原料达 12 种,大麦为 40. 3%、45. 9%、71%、70%、70%、88. 8%、70. 1%,实际这 7 种商品几乎绝对依赖美国^[10](第 259 页)。日成为美这 7 种商品的最重要市场,24. 7% 升至 50 年代的 30%^[10](第 259 页),日商品也需要美市场,13 种主要出口产品中(1956 年占出口总额的 73%)有 5 种对美市场依赖程度最高:鱼类罐头为 38. 2%、33. 7%、49. 7%、61. 8%、83%、24. 8%、21. 1% 和 17. 7%^[10](第 260—261 页),它需要这些廉价日本商品。1956 年美在日输出总额中占 21. 7%^[10](第 258 页),日在“”(1958—1961 年)才开始发展电视。但在 1965 年以前还未形成对美同类产品的威胁性竞争,且新型家电产品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更需要美的技术和原料以及生产资料性产品如机器等。日得到了所需粮食,美则享受巨大贸易顺差:1955—1965 年日对美逆差 18 463 亿日元(同期)13 939 亿日元,日本以此弥补其对美逆差的 75. 3%。经济的强烈互补性是美日“”。

“”、
“”
。美日组成了政治、
美日“”(1947—1965 年)则是经济同盟(1947—1971 年)的黄金时期。
“”
。尤其从 1947 年始,美予日以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援助,帮助日恢复和发展经济之目的就是为了使日避免因物资匮乏和经济崩溃而发生共产主义革命或者被迫倒向苏联。
“”
一,是为了使日富强到足以充任美在东亚反共堡垒的角色,二是为了以日为龙头带动亚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改善该地区民众恶劣的生活状况从而消除“”、“”
,确保诸亲美政权的稳定。“”
。不与大陆建立官方贸易关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日合伙对华推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日对华封锁禁运有一定程度的松动,但在关键性战略物资方面,一直坚持到 70 年代初,从禁运开始到中美和解,两国间完全没有经贸关系。“”
。使日能将本应花在国防上的大量军费开支用于发展经济^⑥。“”
。

通过军需购买使日获得巨额美元,由于日军需品的价格低廉,故可大大降低美军事冒险的开支。
、
,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0 亿美元外,到 60 年代中期由于越南战争又使日赚取近 10 亿美元^[16](P. 98),美还将对东南亚的军事援助与购买日产品挂钩等等
“”
,即“”
。(一)美是战胜国和占领者,日是战败国和被占领者,日加入地区和国际经济组织都须得到美的点头和支持才行。(二)美是资金雄厚、,日则是资金短缺、,因此后者在资金、
、
,在双边贸易中年年赤字。(三)在东亚经济中的经援、
、
,美均占绝对优势,日只占很小的份额,且日对东亚的经济扩张也属于美亚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在亚太扩张的补充。在亚太经济中,美是主宰,日日不过是美的配角。

“ ” ,日的利益必须服从美的利益。 50年代不平等的美日经济关系时,永野信利指出:“ ,打个比方来说,好像贫苦人家的高材生到有钱人家做女婿,是从生活到大学费用均受到照顾的那样一种关系。 ,内心即使对养父养母那种强加于人的态度不满(例如:在强行要求对台湾问题的选择上),都不能提出异议。”^[15](第182页)“ ”

。 1951年10月,首相吉田茂在国会的答辩中表达了不想完全按美的旨意行事的想法和有可能与新中国建交的愿望 ,国务院立即对日政府施压,吉田被迫发表“ ”,承诺按美的意志行事:在对华关系上,只与台湾当局建交。 ,追随美的对华政策达20余年之久,拒绝与新中国建立官方政治和经济关系,宁愿购买比中国原料昂贵得多的美原料。 70年代初美国政府背着日与中国进行邦交正常化的努力时,日才发现上了美的当 ,随着日经济的恢复, (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种地位不平等的程度渐渐地发生着有利于日的变化。 60年代中期开始,亚太经济中的美日关系逐渐呈现出全新的内容和特点:激烈竞争。

:

- ① :东亚指西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
- ② :“ ,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 ,日本愿尽速与那些愿意谈判而其现有领土曾被日军占领并曾遭受日本损害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 ,供各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 。”
- ③ ,原材料应由各该盟国供给,以免给日本施加任何外汇上的负担。” J. A. C. Grenville,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1914-1973*, Stein and Day Publishers, New York, 1974, p. 285.
- ④ 5个协议赔偿对象缅甸、 、 、 、 325亿美元:各国依次为25亿、180亿、80亿、20亿和20亿美元。 “ ”,日本总共只赔偿14.858亿美元。 1955-1965年日本战争赔偿和无偿经济援助占国民收入总值的年均比率仅0.17%。 Harald B. Malmgren, *Pacific Basin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Interests*, Lexington Books, D. C. Heath and Company,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1972, p. 32.
- ⑤ ,但日本的加入无疑大大地方便和加强了它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
- ⑥ ,给韩国38.4亿、 24.18亿、 19亿、 15.23亿美元。
- ⑥ (按1964年的市价),1937年为13.860亿日元,占国家预算的69.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而1955年这三个数据依次变成1.349亿日元,13.3%,1.54%,1965年依次为3.054亿日元,8.1%,0.97%。
- :《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资料来源:日本资料。

参 考 文 献

- [1] [英]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繁荣的形成和破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2] .战后日本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3] BORDEN William S. *The Pacific Alliance*[M].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 [4] .在日本的外国资本[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 [5] NESTER William R. *Power across the Pacific*[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 [6] JAIN R K. *China and Japan 1949-1976*[M].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 Co Ltd., 1977.
- [7] [美]詹塞尔.美国政策中的东南亚[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 [8] [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1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
- [9] CHAY John. *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7.
- [10] [日]垄断资本研究会.现代日本垄断资本[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
- [11] TSU RUMI Yoshihiro.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Foreign Trade*[M]. New York: Arno Press, 1980.
- [12] 金明善.现代日本经济问题[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 [13] WORONOFF J.n. World Trade War[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 [14] 朱立南. 战后日本的对外开放[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 [15] 永野信利. 日本外务省研究[M]. 上海译丛出版社, 1979.
- [16] IRIYE AKira and COHEN Warren I.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M].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USA-Japan“Honey Moon” in the Econom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ZHANG De-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De-ming (1949-),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world history a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Rim.

Abstract The manifestations of U. S.-Japan“honey moon” are: the U. S. gave a lot of help to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s economy; Japan followed America's economic strateg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aithfully; both conspired to seize and enjoyed Asian Pacific markets together; both were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concessive in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 The reasons of the “honey moon” formed are: the result of “a treaty signed under coercion”; strategic need on each side; strong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econom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ney moon” are pronounced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lour; unequal positions in the relation.

Key words the econom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U. S.-Japan “honey moon”; manifestations; reasons; characteristics